

从保证 5/6 工作时间说起

Thoughts on Ensuring a 5-Workday-a Week System

武夷山

(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, 副研究员 北京 100038)

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的时候,“科技兴国”战略方针正激励着广大科技人员努力奋斗。但我们也应清醒地看到,要想把“科教兴国”口号落到实处,工作将是艰辛的,道路将是漫长的。历史表明,科研活动总是易于受到不同种类的干扰和制约,而这些干扰和制约所表现出的长期性、顽固性和严重性却是相当惊人的。在此仅以人们也许已经淡忘了的“保证 5/6 工作时间”问题为例。作一剖析。

早在 1956 年初,周恩来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,就明确提到,要“为他们创造必要的工作条件,保证每周至少有 5/6 的业务工作时间,并同时着力解决图书资料、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等问题”。

1960 年 12 月国务院又专门发布了“关于在科研机构中坚持 8 小时工作制和保证科学研究时间的通知”。

1961 年,聂荣臻同志在向中央政治局所作的“关于当前自然科学工作中若干政策问题的请示报告”中,又说到,今后“5/6 的工作时间必须有保证,不得占作他用”。

长期主持科委工作的武衡同志,1972 年曾尖锐指出,保证科研人员 5/6 的时间搞业务工作,从来未能落实过,并指出,这是“政治可以冲击一切”的后果。

1977 年 8 月,邓小平同志复出后,亲自召集科教工作座谈会,有 13 位科学家、13 位教育家及科技战线领导共 30 多人出席。小平同志在会上再次提到,“至少必须保证 5/6 的时间放到研究工作中去”。

1978 年,小平同志在著名的“3.18”全国科学大会开幕式上又强调说:“我们说至少必须保证 5/6 的时间搞业务,也就是说这是最低的限度”。方毅副总理也在大会报告中提出要做好 12 项工作,其中

一项就是“保证科研工作时间占 5/6 以上”。

可见,广大科技人员及中央领导单就 5/6 工作时间问题,上上下下就已呼吁 20 多年了。

但 20 多年下来,科研人员仍深切感到业务工作时间被挤占,被耗费始终是制约发挥潜能的主要因素之一。改革开放以来,尤其是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来,人们似乎不再听到“保证 5/6 工作时间”的呼声了。因为在新形势下,制约科技人员(尤其是基础研究人员)发挥潜能的主要因素早已变迁为科研经费短缺了。但我们仍不能不注意到,若将科研人员为争取科研经费而四处疲于奔命的时间扣掉,他们剩下的科研工作时间大概也是很难保证“5/6”了。同理,5 天工作制后,“4/5”势亦难以保证了。

再者,1956 年周总理提到的“图书资料、工作设备及助手配备”等问题不仅长年未获解决,而且问题愈演愈烈。仅以图书资料为例,我国绝大部分图书情报机构都面临采购经费严重不足的困境。如笔者所在的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(原中国科技情报研究所)在 80 年代曾订有 8 000 多种外文报刊,那时尚能较好地满足各方读者的需要。但由于外文报刊不断涨价,而国家拨给的文献采购费用却多年基本不变,再加上外汇并轨因素,结果所里外文报刊订购量剧降到不足 400 种。而且连年来还对中国图书进出口公司欠下一大笔外刊外汇债。外刊订阅如此之少,以至所内的期刊阅览室经常呈现出门可罗雀的凄凉景象,每天读者流量仅几十人。

许多科学家惊呼:图书情报资料严重短缺已成为制约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新的瓶颈。如何解决“5/6”、图书资料以及科研设备落后等老大难问题,大家正翘首以待。希望在“科教兴国”新国策下,无须再呼吁、再期盼另一个 20 年了!

(责任编辑 蔡德诚)

补正:本刊今年第 5 期(总第 107 期)上“维护科学尊严,维护教育纯洁——揭露两起恶性抄袭事件”一文中,提及的“同济大学学报 1995 年第 6 卷第一期”,应补正为:“同济大学学报(人文、社会科学版)1995 年第 6 卷第一期”。该学报自然科学版与此次抄袭事件无关。

——本刊编辑部